

衛方濟的經典翻譯與中國書寫：文獻介紹

潘鳳娟

本文嘗試介紹中國禮儀之爭時期，耶穌會士衛方濟所譯著與中國有關的文獻。儘管羅馬教廷對中國禮儀的禁令已頒布，他仍積極透過經典翻譯與書寫，系統性地建構了一套奠基在其對經典與注疏傳統的理解，以及各種不同身分人士所提出的意見上，引向對中國禮儀之倫理面向的再詮釋，最後以帝國正統（康熙）作為對經典最終、最權威性論述的「中國哲學」。他的經典翻譯與中國書寫，直接影響了近代歐洲的啟蒙運動。作為如此重要的作者，衛方濟的譯著卻被塵封三個世紀，研究成果罕見。本人不揣淺陋，暫就目前已取得的衛方濟名下七件文獻，依時序進行初步介紹，為將來深入研究鋪路，也希望藉此為中國文獻的歐譯史做出貢獻。

關鍵詞：衛方濟、經典翻譯、中國禮儀之爭、耶穌會、中國哲學

收件：2010年1月12日；修改：2010年1月21日；接受：2010年1月28日

François Noël's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Writings on China: A Preliminary Documental Survey

Feng-chuan Pan

This paper aims at a preliminary documental survey of François Noël's (1651-1729)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writings on China. Leaving the Papal prohibition of 1704 behind, Noël published a series of books defending Chinese rites. He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ed a "Chinese Philosophy" via translat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n the foundation of varied Chinese commentarial interpretations, and in a way turn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in Europe into a more political and moral orientated tradition by highlighting the Kangxi Emperor's authority above all commentarial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i. Although Noël's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he is still quite an unknown figure in academic circles. If we read and analyse Noël's work against a backdrop like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his books clearly deserve our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seven of Noël's documents that I have found will be introduced as the beginning for my future exploration of Noël's work. With this, I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Sino-Western encounter.

Keywords: François Noël, the transl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Jesuits in China,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Chinese Philosophy

Received: January 12, 2010; Revised: January 21, 2010; Accepted: January 28, 2010

1700年，羅馬教廷禮儀禁令的前哨索邦神學院的神學家對利瑪竇派耶穌會士的中國傳教作出裁定，譴責他們有關中國道德、風俗、以及上帝知識等方面的觀點，對「神聖的基督宗教來說是虛假、虛妄、誹謗、錯誤和侮辱的」¹。1704年，天主教宗克萊孟十一世（Clement XI, 1700-1721），正式禁止中國耶穌會的禮儀政策與上帝譯名（Noll, 1992, p. ix, pp. 8-24）。1715年，同一教宗重申1704年的禁令，頒布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通諭，嚴令完全遵守之，否則開除教籍。這命令在1742年被新任教宗本篤十四（Benedict XIV, 1740-1758）加以絕對化，自此任何有關中國禮儀的討論也完全禁止（Noll, 1992, p. xii, pp. 47-62）。在這關鍵時刻，1703年至1711年之間，衛方濟（François Noël, 1651-1729）卻密集出版他的經典翻譯和中國書寫，捍衛中國哲學和禮儀。

1983年，在慶祝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紀念學術會議上，孟德衛（D. E. Mungello, 1943-）透過比較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一書，探討耶穌會對儒家經典《四書》的翻譯最完整的，衛方濟的《中國六經》（*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1711）之後，他說：或者因為耶穌會高層畏於推廣此一譯本，也因為在衛方濟之後歐洲漢學界不再對《四書》的不同注疏本持肯定態度，加上衛方濟的著作中隱含著再次引爆中國禮儀之爭的成分，儘管《中國六經》是繼《中國哲學家孔子》以來，耶穌會士翻譯儒家經典《四書》完整本的最高峰，其譯文也優於前人，卻默默地被塵封至今（Mungello, 1983, pp. 516-539）。

衛方濟在1651年出生於比利時，十九歲加入修會。三十三歲那年啓程離開歐洲東來，1685年八月間抵華。1687年到1690年間往來日本、廣東和上海等地。1691年居住江西贛州。1692年到1700年似乎常駐江西南昌，這段期間，在中國有關禮儀的兩件同等重要，卻可能互相衝突的文件被發布：一為康熙頒布宗教寬容敕令（1692），使天主教傳教合法（Mungello, 1995, pp. 3, 15, 149-152, 173-174, 294）。另一為1693年，時任福

建主教、屬巴黎外方傳教會之宗座代牧嚴璫 (Charles Maigrot, 1652-1730) 所發布之禁令 (Noll, 1992, p. ix, pp. 8-10), 禁止其轄區境內的教友和神職人員執行或參與耶穌會士所允許的中國禮儀。嚴璫同時派出代表將他的禁令帶回歐洲, 轉給巴黎主教, 請索邦神學院進行檢查, 此舉恐將危及耶穌會的中國傳教 (Minamiki, 1985, pp. 39-40), 而衛方濟約在此時完成《中庸》和《孟子》的翻譯 (Mungello, 1983, p. 517)。索邦神學院在 1700 年做成決議定罪耶穌會的適應策略之後, 1702 年一月中國的耶穌會高層立刻派遣代表回歐洲辯護, 經過幾番波折, 衛方濟和龐嘉賓 (Gaspar Castner, 1655-1709) 終於成行 (Dehergne, 1973, p. 186)。1703 年 12 月 31 日, 代表團抵達羅馬, 但是此行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效, 因為 1704 年, 教宗克萊孟十一世正式禁止耶穌會的適應策略和中國禮儀 (Dehergne, 1973, p. 186; Noll, 1992, p. 24)。1707 年衛方濟回到中國, 立即在 1708 年一月又陪同康熙所派出的大使艾遜爵 (Joseph Antonio Provana, 1662-1720) 和陸若瑟 (Raymond de Arxo, 1663-1711) 再度回到羅馬, 不過此行卻再也無緣再返中國。1709 年, 衛方濟轉往布拉格, 繼續進行經典翻譯與中國書寫工作, 1711 年陸續出版。書籍出版後不久, 他轉往今日法國邊境里爾地區 (Lille), 到 1729 年 9 月 17 日過世之前, 似乎一直居住在此地。可惜目前沒有進一步資料說明這段期間的生平事蹟, 僅知在 1715 年和 1716 年, 在教宗克萊孟十一世重申禁令之後, 衛方濟曾兩度意圖返回中國未果。其中 1716 年那次, 他試圖從里斯本前往中國, 仍被迫回到歐洲 (Dehergne, 1973, pp. 185-186)。魯保祿認為這應該是生病或船隻問題導致, 而非上級介入 (Rule, 2003, p. 161)。但早期學者如雷慕沙與費賴之均語帶「暗示」, 猜測天主教當局恐有阻撓其返中國的舉動。惟目前所能掌握之資料不足以判斷何者較為可信, 其真正原因待考。

在其首度返回羅馬為耶穌會之中國傳教策略辯護時, 衛方濟曾於 1703 年發信給耶穌會總會長, 報告中國傳教會之現狀。信中說明鄉村地區的傳教工作是如何地興盛, 遠比北京等城市地區之發展更為迅速。他認

為鄉村之自由度是重要因素（鄭德第、朱靜、耿昇、呂一民等譯，2001，頁 230-239）。信中指出江西地區的幾位耶穌會士在 1696 至 1697 年間總計為四、五千人施洗，顯見 1692 年康熙發布容教令後，教務之蓬勃發展。這似乎暗示著 1693 年位處福建主教嚴璫之禁令恐為此樂觀發展的現狀投下變數。約在此信中所描述的期間，《人罪至重》（1698 年）一書在北京出版。雖然生平資料顯示此時衛方濟應該是在江西一帶，而此書之序文內容以及序文作者籍貫（兩位中國仕紳均為江西人士），均顯示成書地點應為江西。可能因為衛方濟後來受上級任命返回歐洲辯護中國耶穌會的傳教與中國禮儀，因而前往北京出版。

衛方濟在江西的工作細節，目前資訊不多，不過幾位同時期、且同在江西一帶活動的教友和傳教士的文獻則透露些許訊息。方濟各（Francesco Saverio Filippucci, 1632-1692）曾經兩度在 1680 至 1683 年和 1690 至 1692 年間擔任日本省會長。而 1688 至 1691 年間，他同時擔任日本與中國之視察員。此時期衛方濟初入中國；他曾經幾度申請前往日本傳教未果，及轉往中國內地工作（Rule, 2003, pp. 138-139）。衛方濟進入江西是 1691 年，而方濟各隔年過世，他們應有相當程度之聯繫，而且衛方濟可能某種程度上繼承了方濟各在江西的角色與工作。另外，衛方濟與聶仲遷（Adrien Grelon, 1618-1696）曾經在 1691 年間共事於贛州，聶仲遷之助手夏大常在 1698 年，也就是與《人罪至重》出版的同一年，撰述《祭禮泡製》一書，為教友實踐中國禮儀尋找中國經典的基礎與詮釋（Dehergne, 1973, pp. 119-120），足見江西地區的天主教會，無論教友或耶穌會士，均對福建地區因嚴璫禁令而來的爭議，展開文獻探索。衛方濟與上述幾位耶穌會士和中國教友應該有相當程度的聯繫（詳後衛方濟書目介紹）。

歷來學術界對衛方濟的關注，間歇有之。在《中國六經》的法譯本出版之前，法國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曾在《中華帝國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 1735）中譯介衛方濟的《中國六經》。近期本人研究衛方濟的《孝經》翻譯以及後續的不同譯本時（潘鳳娟，2009b），

發現在羅馬禁令後，駐北京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曾在與錢德明（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等人合編之《關於中國之記錄》（*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s Pékin, 1776-1791, 1814*，共 16 卷）之第四卷出版諸多有關孝道之官方文獻的翻譯與介紹。由於不滿 1711 年衛方濟的譯本僅翻譯經文，韓國英的譯本包含 56 個大篇幅腳註，並宣稱其《孝經》翻譯不同於衛方濟的「古文」（Kou-ouen, vieux texte），乃是根據「新文」（Sin-ouen, nouveau texte），即康熙朝學者士子公定文本而譯。並且區別「帝國文獻」（les œuvres Impériales）與「文人文獻」（les œuvres littéraires），意指衛方濟所據為文人撰述，而自己則是根據當時官方所頒布的文獻。從衛方濟之《孝經》譯本在《中國六經》中出版後不久，兩個《孝經》法譯本，一為根據衛方濟拉丁本所譯，一為針對衛方濟譯本的缺失另作新譯。從兩譯本相繼在巴黎初版來看，衛氏的翻譯不僅如前述直接影響萊布尼茲和伍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等德國哲學家，同時也對巴黎學術圈產生影響。

除此之外，清末英美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中，也引介衛方濟生平和經典翻譯工作。廿世紀以來，學界對衛方濟的研究稍有進展，間或有文章提及，但是專論仍未得見。費賴之（Pfister, 1932, p. 416）稱讚衛方濟中文程度高、為耶穌會士中積極從中國經典探索基督教真理，並為其辯護的重要人物之一。總括來說，目前學界對衛方濟的研究，除費賴之之外，以魯保祿（Paul Rule, 1937-）和孟德衛最為完整詳盡（Mungello, 1983; Rule, 2003）。魯保祿文中提到一份教宗特使多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隨行人員 Sala 的手稿，稱之為撒拉報告（Sala papers）。手稿中記載衛方濟被指控為耶穌會適應策略的反對派。雖然該傳聞出處和真實性目前不可考，不過，魯保祿則是以衛氏否認多羅主教對他的控訴，主張衛氏持支持利瑪竇一派對中國禮儀的立場（Rule, 1995, pp. 260-261）。引介衛氏著作的文章中，

有幾篇討論衛方濟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六經》為伍爾夫提供的中國形象，如何促使後者對中國實踐哲學的仰慕，甚至積極提倡所引發的後續效應²。

研究衛方濟的最大困難，是資料取得不易，其次是語言的門檻很高。孟德衛和魯保祿是少數能突破前述兩個困境的學者，他們的論文已經為衛方濟的生平與思想建立初步架構。前者焦點是《四書》完整本的翻譯，後者是禮儀之爭中衛方濟的角色。如前所述，作為禮儀之爭中如此重要的人物，衛方濟的經典翻譯與中國書寫卻被塵封三個世紀，研究成果罕見。本人暫就目前已經取得的衛方濟名下七件文獻，依時序進行初步介紹，慢慢突破前述兩個困境、逐漸累積能量，為將來全面深入研究衛方濟的工作鋪路，也希望藉此為中國文獻的歐譯史做出貢獻³。

一、《人罪至重》（1698 年）

目前所知，除《人罪至重》（1698, 1873）一書外，其餘皆為拉丁文本⁴。此書也是明清耶穌會的著述中，極少數完整且系統化論述天主教罪論的文獻。不同於耶穌會入華初期如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的《七克》（1604）和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滌罪正規》（1627）等書之側重罪的解除方法與禮儀實踐層面，衛方濟指出罪的根源性，主張「修德必先遠罪」，使罪論與中國修身觀接軌，並延伸討論倫理秩序與聖治圓滿達成的要件。他以至大之天主對比至微之罪人，凸顯「人罪至重」，證成人類乃「獲罪於天主」而非「獲罪於天理」。與艾儒略《滌罪正規》一書所言之「滌於已犯之後」相為表裡，《人罪至重》一書目的在於「警人遠罪」與「禁於未犯之先」。此書從「罪論」做為起點，以轉向「倫理秩序」，以天主十誡作為滿足「仁」與「義」的教條，以達致「聖治」的終極目標，為「天主、己與人」三角倫理關係的和諧為除罪後之仁義圓滿的狀態⁵。《人罪至重》出版時間大約是嚴璫禁令發布六年之後，衛方濟徵引古代經典：《孟子》、《詩》、《書》、《禮》、《春秋》、《新唐

書》⁶，延續利瑪竇一派之耶穌會士的經典詮釋策略，也區分古儒與宋儒歷引古經，對明清之際的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現象予以嚴厲批判⁷。而且他歷引古經之舉，也與嚴璫禁令後諸多中國教友所撰，紛紛從中國古經尋找禮儀原始意義的手法相似。

二、《對中國學者關於禮儀問題之論證的摘要》

此書由衛方濟和龐嘉賓共同署名，編輯、彙整與譯介了十份文件，包含八篇見證（testimonia），不同身分背景的人士，如中國教友、中國教區協助教務的人、耶穌會士、方濟會士等，對中國禮儀問題有關天（Tien）與上帝（Xam ti）的稱呼、有關「欽天」牌匾（tabella King Tien）的意義與相關問題的意見。值得一提的是，此書收錄了與衛方濟同在江西傳教，由方濟各所寫的一本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書⁸之目錄逐條列出，收在編號六號的文件中，討論中文「祭」、「主」等字的意義（Noël & Castner, 1703b, pp. 57-60）⁹。同一文號還收錄西班牙道明會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ca. 1610-1689）。七號文件收錄中國教友如李九功（Ly Kieu cum, d. 1681）的〈禮俗明辨〉（Lyso Mim Pien）（Noël & Castner, 1703b, pp. 63-65）¹⁰、李多默（即李九功，Ly Thomas）的〈證禮葛議〉（Chim li Cu y）（Noël & Castner, 1703b, pp. 65-66）¹¹、嚴謨（Paulus Yen, d. 1640?）所撰之〈辨祭〉（pien Ci, seu discursus de diversitate oblationum Ci）。嚴謨此文乃為駁斥道明會士萬濟國（Francisco Varo, 1627-1687）的〈福安辯祭〉而作（Noël & Castner, 1703b, pp. 66-67）¹²。方濟各曾經指派人稱贛州夏相公的夏大常調查生祀等問題，約在1686年之前撰寫報告回覆¹³。此文也被衛方濟收錄，題名為 Hia Matthias in responsionibus manuscriptis ad varia Quaesita¹⁴。

依據目錄看，書末收兩份文件，一是1700年中國康熙皇帝對中國禮儀中有關天、孔子與中國古代傳統等等的意見，標題為：*Brevis Relatio eorum, quae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m Imperatoris Cam Hi circa Caeli, Confutij,*

☞ *Auorum cultum datum Anno 1700. Accedunt Primatum, Doctissimorum Virorum, antiquissime traditionis testimonia etc.*。這份文件是由安多 (Antoine Thomas, 1644-1709)、閔明我 (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38-1712) 以及徐日昇 (Tomé Pereira, 1645-1708) 等多位北京耶穌會士，在 1701 年七月共同簽署完成，高舉康熙皇帝對譯名問題的解釋¹⁵。不過，這份文件僅出現在目錄，內文未見。另一份文件題名為：*Responsa Sac. Congregationis vniuersalis Inquisitionis à SS. D. N. Alexandro VII. Approbata*，這是 1656 年 3 月 23 日，由教宗亞歷山大七世和傳信部認可衛匡國的中國匯報而作的對耶穌會有利的裁決內容。強調孔子是儒生的導師，中國禮儀不是偶像崇拜，是單純的政治和市民行爲，而非迷信¹⁶。

三、《對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答覆》¹⁷

這是 1704 年由衛方濟和龐嘉賓共同署名，針對 1693 年福建代牧嚴璫 (Charles Maigrot, 1652-1730) 以及其他抨擊耶穌會的中國禮儀政策言論一一反駁的文獻。後來在 1711 年衛方濟所出版專書，可能將上述眾人的意見彙整，提出更具系統性的論述，在布拉格出版。

四、《1684~1708 年在印度和中國的數學物理觀察記錄》 (1710 年)

除了經典翻譯、中國禮儀問題、中國哲學之外，衛方濟的譯著目錄中，有一本有關數學和物理的科學性書籍。此書主要記錄了 1684 至 1708 年之間，衛方濟兩次往返中國與歐洲的過程中，在中國與印度所觀察到的天文星象地理。書中尚有中國各大城市經緯度表 (Noël, 1710, pp. 37-40)、中西紀年，如天干地支生肖的對照表 (Noël, 1710, p. 59)、中西星象表 (Noël, 1710, pp. 62-63)¹⁸ 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與後面將介紹的敏感書籍約同時期在同一城市出版，此書的封面並沒有特別註記經教宗特殊許可而出版 (詳後)。

五、《中國六經》（1711 年）

衛方濟名下兩件分量最重也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 1711 年在布拉格出版的經典翻譯巨著《中國六經》一書（Pfister, 1932, p. 416; Dehergne, 1973, pp. 185-186）。此書包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小學》六本中國典籍之拉丁譯本。此譯本是繼 1687 年由柏應理主持的《中國哲學家孔子》¹⁹ 將四書其中三本：《大學》、《中庸》與《論語》翻譯為拉丁文之後，耶穌會翻譯中國經典歷史的重要里程碑。

衛方濟將《大學》譯為「成人之學」（*Adultorum schola*），《小學》譯為「童幼之學」（*Parvulorum schola*）。若根據朱子所說：「大學」與「小學」的區別在於：「大學」在於教導「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但這一切都必須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的日常生活功夫作為基礎²⁰。似乎衛方濟此新譯本選書的標準，倫理站了上風。中國禮儀之爭，辯論著中國經書中的天和上帝是否與天主教的 Deus 等同，實際上，發展到後期，禮儀的倫理性質慢慢突顯出來。1783 年至 1786 年間，《中國六經》被譯為法文陸續出版，題名為《中華帝國經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此法譯本分為七卷，刪除了衛方濟原書中給讀者的前言，卻加入一整卷譯者 François-André-Adrien Pluquet（1716-1790）所撰有關〈中國政治哲學及倫理哲學的起源、性質和意義的觀察〉（*Les observations sur l'origine, la nature et les effets de la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ans cet empire*）長文，更進一步從政治和倫理面向介紹中國經典。與此同時期，其他耶穌會士，如前述提及之駐北京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和與錢德明等人大量譯介中國帝國文獻的舉措，也是與此詮釋趨勢一致的。

從目前存世的文獻來看，布魯塞爾圖書館藏有衛方濟所譯《孟子》與《中庸》的中文與譯文文件，時間與地點標示為 1700 年南昌。而聖彼得堡圖書館則藏有《論語》之譯本，同樣標示為 1700 年南昌（Pfister,

1932, p. 417)²¹。這顯示至少在 1700 年之前，衛方濟已經完成前述三部中國經典之翻譯工作。而且翻譯的地點應不在歐洲，而是中國本土或航行途中。換句話說，1698 年出版《人罪至重》不久，衛方濟的翻譯工作已經進行一大部分，而返回羅馬為中國傳教辯護效果不彰，約略 1709 至 1710 年間才前往布拉格並在此地將過去累積的翻譯成果出版，成為《中國六經》。而在此之前《人罪至重》一書中引用大量中國古經經文，或者也是此翻譯過程累積而成。

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在其《亞洲雜纂》(*mélanges asiatiques*, 1826) 和《亞洲新雜纂》(*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1829) 曾經評論衛方濟的翻譯，說他：「不但翻譯文本，而且選擇注疏，得為孔子與孔門諸子之說，翻譯較為完備者，誠無過於是編。但亦有弊，方濟對於文本不明者，輒以己意解釋，隱諱者為之補充，有時反失原意。」(馮承鈞譯，1995，頁 420；Abel-Rémusat, 1826, p. 300; Abel-Rémusat, 1829, p. 128, pp. 254-255) 而根據孟德衛研究，衛方濟說他翻譯《四書》與《小學》不僅是要協助歐洲讀者理解中國人的思想，而且，全中國的孩子都必須研讀、背誦這五本書，方得通過考試取得秀才資格。而《孝經》與五經更是所有秀才都必須詳讀以通過考試獲得舉人的重要經典。他決定不翻譯五經而是這六部文獻，是因為五經不像這六本書一樣被背誦研讀。而且日本、韓國、越南等地都相當重視這六部文獻。衛方濟說明《中國六經》的完成，是延續羅明堅與利瑪竇等中國耶穌會士們長年來翻譯《中國六經》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前人所譯《四書》便成為後來耶穌會學習中國文言文的教材。衛方濟之前的耶穌會士之所以不翻譯《孟子》是因為孟子的無神思想，而衛方濟對《孟子》所呈現的對政治、倫理層面的忠孝仁義德行非常讚賞²²。孟德衛比較了柏應理與衛方濟兩人的譯本前言，發現前者因為其思想的物質主義與無神傾向，拒絕了他們所謂的當代 (Neoterics, Modern) 理學家朱熹的思想，企圖回歸《四書》古典意義。他們借助張居正 (1525-1582) 的《四書直解》(1573) 以理解經文的古典意義之舉，

誇大了張居正與朱熹之間的差異 (Mungello, 1983, pp. 521-522)。孟德衛也注意到衛方濟與白晉等經學派（符象派）耶穌會士之間的可能聯繫，因為在 1700 年左右，他們都在北京。白晉比衛方濟早一年，而後來的傅聖澤與馬若瑟則是遠比衛方濟資淺。Louis Nyel (1670-1737) 更直言當時在歐洲，除了衛方濟之外，沒有人能夠評論傅聖澤對中國經典的符象派式詮釋。衛方濟對後來的經學派耶穌會士之影響力仍值得繼續深探 (Mungello, 1983, p. 526)。

六、《中國禮儀札記》(1711 年)

除了經典翻譯之外，在出版《中國六經》的同一年，衛方濟同時出版了兩件爭議性著作：一為有關中國祭天和祭祖的《中國禮儀札記》(*Historica notitia rituum et ceremoniarum sinicarum*, Historical notice of Chinese rites and ceremonies)，另一為《中國哲學》。本人所見上述兩書藏於捷克布拉格國家圖書館 (Klementinum, The Clementinum)²³，其前身即是耶穌會的神學院，於 1562 年開始建立²⁴。衛方濟於 1709 年前往此處，似乎無視於教宗克萊孟十一世的禁令，兩年之後連續出版重要卻敏感的書籍。

《中國禮儀札記》是有關中國祭祖與喪葬禮的歷史性紀錄。此書前三章探討中國禮儀的根源、演變，以及中國人對人、動物和靈的認識。第四至六章，討論葬禮與祖先牌位 (Tabellæ *Chu*) 等問題。第七、八兩章探討祭祖之「祭」這個字，以及祭祖與祭孔的相關問題。此書與 1703 年，由衛方濟與龐嘉賓 (Casparo Castner, 1665-1709) 合作的，其內容與〈1656 年三月 23 日教宗亞歷山大七世之中國禮儀許可有關稱呼天與上帝與敬天牌匾的記錄〉有不少相似性。費賴之 (L. Pfister, 1932, p. 418) 引用 Pauthier 的話說：「此書（按：《中國禮儀札記》）甫出版即奉上級人員命令禁止，故出版後不久即經原著者將所刊書本收回。」所以流傳不多 (馮承鈞譯，1995，頁 420)。

根據筆者在捷克布拉格國家圖書館所見之《中國哲學》與《中國禮

儀札記》二書的封面，有相當特殊註記如下：“De speciali Licentia SSD. N. D. CLEMENTIS PAPÆ XI ET SUPERIORUM PERMISSU”。封面文字強調此書之出版「具有我們最神聖的教宗克萊孟十一世的特殊證明與上級許可」(With the special licence of our most holy Lord Pope Clememt XI and the *permission* of superiors)。一般而言，耶穌會士出版教理相關的書籍，基本上需要三位會士詳閱後，經會長批准即能出版。這兩本書卻需要註明具備教宗克萊孟十一世 (Clememt XI) 與耶穌會長的特別許可，實在非比尋常，給人一種欲掩彌彰的印象。這位克萊孟十一世正是在 1715 年下令嚴禁中國禮儀的教宗。1711 年在衛方濟連續出版幾本重要著作時，這位教宗任命特使多羅前往中國傳達禁令。同時發信通令葡王、澳門主教嚴禁中國禮儀。前述學者如費賴之撰寫衛方濟生平時，字裡行間令人玩味不已。本人以為這種對衛方濟似乎遭受言論箝制的種種揣想，且隱約流傳在後期作者文獻中的現象，顯然並非空穴來風。不過詳情需更多相關脈絡性證據方能進一步申論。

七、《中國哲學》

這是衛方濟另一本引發爭議的專書，基本上是在經典翻譯基礎上，非常系統性地建構一套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一書包含三個部分：上帝譯名、祭祖祭孔禮儀、中國倫理。第一部分論證中國人是否認識 DEI 這「第一存有」(De cognitione primi Entis, seu DEI apud Sinas)，衛方濟依循經院神學的作法，逐一解析。他仔細地區分「古代經典」、「古代作者」(antiquos Authores) 的不同意見，從中文「天」與「上帝」的字面意義及其完美性，仔細推敲對比這些中文名詞與 caelo (天)、caeli Domino (天主)，探詢中國古籍與古經典中所載是否證實中國古人認識天主教的最高主宰 (Dei cognitionem)，或者其實是無神論者 (Atheos)。在第一部第二章問題五～六：衛方濟提出「郊社」(Kiao Xe) 與「太極」(Tay Kie) 兩個名詞，來討論從經典延伸而來、在中國注疏傳統中，有關天地之祭和

宇宙生成說的後續論述，藉此探索從注疏傳統而來對古典的新詮釋能否與天主教的至高主宰等同²⁵。在第三章最後一段落，衛方濟引康熙皇帝對「天」和「上帝」的詮釋，為辯護譯名爭議的聲明提出一個合法意義，而將詮釋權從文人轉到皇帝，訴諸帝國權威²⁶。

《中國哲學》的第二部分辯護中國禮儀，其首要討論的問題是：事效性或人效性²⁷。因為若要判定中國禮儀是否「迷信」，必須先考量祭祀行動所產生的效能，是來自其儀式本身內在能力（*intrinseco*）抑或參與者自由意志（*extrinseco*）²⁸，前者強調事效性，後者強調人效性。所謂事效（*ex opere operato*）²⁹指儀式本身的效力。所謂人效（*ex opere operantis*），意指禮儀的能效來自施行者或領受者的虔誠、才德與誠心。在討論告解聖事時，衛方濟以十誡論「天主、人、己」之仁義，重新詮釋聖治之圓滿的內涵本質與形式之雙重意義，並以「心與禮」雙重條件的滿足，作為罪完全豁免得救的要件³⁰。其所涉及的也是儀式本身的效力問題。而在此書中論及中國祭禮中的神主牌（木主，*Mo chu*）³¹的設立與祭拜動作時，衛方濟也探問相同問題。

《中國哲學》的第三部分標題是中國倫理（*De Ethica Sinensi*），他區分出世倫理（*Ethica Monastica*）、家族倫理（*Ethica Oeconomia*）和政治倫理（*Ethica Politica*）³²。衛方濟從人類行動的目的（*finalibus*）、效應（*effectivis*）、共同效應（*coeffectivis*）和屬性（*proprietas*）不同原理分別進行討論。《中國哲學》一書可說是耶穌會士對中國經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因為他先從古代經典（*antiqui Libri classici*）中有關「天」、「帝」與「上帝」等名詞的出處和意義進行論證，其次從注疏傳統（*libri Sinici recentiores, antiquorum Classicorum interpretes*）進一步探討這些名詞在中國如何被詮釋與理解，第三部分提出康熙皇帝的帝國詮釋。因為利瑪竇的論證方式基本上是，從古經找證據，如果古經書中沒有而宋明儒家的注疏才出現的，就會成為他攻擊後儒的切入點，例如太極一詞。利瑪竇把中國古經書中的「上帝」等同於天主教的 *Deus*，並在古儒與今儒間作出區別，

以古儒駁斥宋儒的做法，並未獲得所有同會耶穌會士的支持。他的接班人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o, 1565-1655）對於中國經典的態度則相當不同。他認為，無論古儒還是宋明儒都是「無神論者」（Athées），全盤駁斥儒家（潘鳳娟，2007，頁 51-77；Leibniz, 2002, p. 84）。而衛方濟的後輩耶穌會士如韓國英等人對中國經典的翻譯便走向帝國的詮釋（潘鳳娟，2009b）。

儘管衛方濟似乎無視於教宗禁令，《中國哲學》一出版，很快面臨嚴格檢查。費賴之（Pfister, 1932, pp. 417-418）認為可能因為此書對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討論篇幅過大，所以有礙書籍傳布。根據雷慕沙（Abel-Rémusat, 1829, pp. 252-257），在其《亞洲新雜纂》第二卷中對衛方濟《中國六經》與《中國哲學》二書的介紹，他認為是衛方濟對中國傳統的立場遭受天主教會反對，書籍遭禁。此書出版不久，教宗克萊孟十一世在 1715 年立即重申自己在 1704 年的禁令，嚴格命令所有人服從，否則開除教籍。衛方濟卻選擇返回中國的懷抱。目前僅知 1715 年和 1716 年他曾兩度嘗試，但時不我與，最終隨著他那批被禁、被塵封的譯著，1729 年魂歸歐洲的塵土。

綜觀衛方濟的譯著作品有三個重點：（一）中國經典，（二）後人對經典的詮釋，以及禮儀之爭期間各種不同身分所提出的意見，（三）以帝國的詮釋（康熙）作為對經典的權威性論述。《中國六經》在中國禮儀之爭的敏感時期翻譯，在羅馬確認禁止耶穌會在中國傳教所採取的適應策略之後才出版，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衛方濟在翻譯禮儀之爭中爭論不下的重要概念如「天」、「上帝」時所使用的對應名詞與柏應理等人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並不相同。同為影響歐洲啟蒙深遠的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與伍爾夫二人，根據不同經典翻譯版本，對中國傳統的研究，卻得出截然不同結論。前者所見為柏氏譯本，後來撰文主張中國哲學為自然神學，認為「理」應被看作第一原理，即上帝自身（Pan, 2007, pp. 491-514）。後者在其〈中國實踐哲學講話〉中指出，

當 1721 年他發表有關中國實踐哲學的演說時，只見到衛方濟之《中國六經》，未見柏應理之《中國哲學家孔子》³³。伍爾夫還指出，在《中國六經》中，天主教信仰中至高者名稱 *Deus* 並未出現。在此基礎上，伍爾夫主張中國為不信神論，且無須基督宗教之神的恩典即能建立高度發展的倫理社會，藉此為他自己建立一套獨立於神學之外的倫理哲學，使歐洲啓蒙又向前邁進一大步³⁴。

其次，從衛方濟的《中國哲學》內容，我觀察到他提出一套非常系統的神哲學論述。我估計，衛方濟翻譯《中國六經》，他對經典和注疏傳統的挑選，與《中國哲學》之所以能建構如此系統性論述，應該有相當密切的貫性。也許多年的經典翻譯工作與對中國禮儀的考察，衛方濟得以在前人翻譯基礎之上，以一種相當典型的經院神哲學之論證方式，建立了一套極具系統的中國哲學。衛方濟身為中國禮儀辯護者，不同於耶穌會早期的翻譯，他在《四書》之外補入《孝經》和《小學》，不僅使《四書》的歐譯完整，且使之與《大學》合觀，一併介紹中國教育理念，似乎有意在經典之上加入自己詮釋。他可能也意識到，在中國，禮儀是一個倫理議題，其核心是孝道，所以當問題落入禮儀是否為宗教行為時，已經偏離。衛方濟篩選經典的標準，可能與此有關。而完成經典翻譯之後，又出版了《中國哲學》，系統地建構一套奠基在其經典翻譯，與對中國注疏傳統的理解之上的哲學，引向中國禮儀之倫理面向的再詮釋。此舉與其前輩以形上學為基礎來討論中國儒學的方式，已經大不相同。

最後，本人近年研究發現，明清之際耶穌會引介中國傳統進入歐洲，似乎有從中國歷史、經典的譯介這種以「中國」整體為介紹標的物的方式，轉向以聖哲孔子為首的儒家，作為重要譯介對象的趨勢。到了中國禮儀之爭的後期，又再一次轉向以賢明皇帝「康熙」成為他們譯介撰述中重要的聖王形象。從衛方濟與龐嘉賓等耶穌會士在為中國禮儀辯護的文獻中，以康熙對中國禮儀的詮釋作為權威文本的作法可見一斑。這種轉向最直接與具體的例子之一，就是 1697 年所謂的國王數學家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 獻給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的《中國皇帝的歷史面貌》(*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此書出版不久隨即被萊布尼茲收入他的《中國近事》第二版 (*Novissima Sinica*, 1699)，而英國倫敦立即出版此書的英譯本 (Bouvet, 1699)。顯見此書不僅在政治圈，也在文人圈中傳布 (梅謙立等譯，2005)，而且不僅在歐陸，也在英倫地區被閱讀。中華帝國的政治和倫理，成為歐美知識階層關注焦點。時序再往後延伸，在十八世紀末期，北京耶穌士如韓國英，更是直接全面地譯介清朝的「帝國文獻」，相對於此，衛方濟的簡短引用康熙皇帝的詮釋，大量譯介中國士紳和教友們的意見，似乎反而成了韓國英筆下的太專注於「文人文獻」了。本人認為，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際歐洲對中國的認識，似乎是從一個模糊的「中國」印象，過渡到以「孔子和儒家」為中心，再轉向以康熙為核心的「帝國」印象。此一不同形象的建構、傳播與演變過程，歷經近一個世紀。這個過程，可以說是從「歐洲－中國」的抗衡，進入「教宗－皇帝」的抗衡。中國之敬天、祭祖禮儀原以「孝」為其核心，沒有當代所謂神聖宗教或世俗文化的區分。在中國禮儀之爭過程中，這兩個面向卻逐漸被二分與對立，歐洲的啓蒙運動也逐漸展開，世俗化進程被啓動。教宗與君王之爭，似乎在禮儀之爭中，逐漸分出高下，前述之「教宗－皇帝」的抗衡似乎變成「聖－俗」抗衡。前述從耶穌會士，尤其是衛方濟的經典翻譯與中國書寫觀察而來的變化，或可管窺近代中歐交流的發展脈絡，並促進學界重新閱讀與反思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的關係。

衛方濟確實已經魂歸歐洲的塵土，但是，他透過譯著文字所傳達的訊息，雖被塵封三個世紀，近年已經重見天日。其所譯著的文獻到底具備什麼內容，對前述進程的貢獻及其所扮演角色，著實值得學界更深入探索。而他的中國書寫，則待有志者接筆，延續其未竟之功。

感謝詞

本文撰寫所需珍本古籍乃經以下學者專家協助方能取得，謹此敬致謝忱：感謝高華士博士 (Dr. Noël Golvers)、李世佳教授 (Prof. Dr. Vladimír Liščák)、羅然教授 (Prof. Dr. Olga Lomova)、Katarína Feriencikova 女士、Veronika Rákocy 女士，和 Vincent Reniel 先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已依建議修訂。本文研究受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謹此致謝。計畫題目：「譯釋之間：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 1651-1729) 的經典翻譯與中國書寫」(編號 NSC97-2410-H-003-086，期限 2008/08/01-2009/10/31)。

註釋

1. 請參見 “Censure de la sacrée Faculté de Théologie de Paris” (轉引自 Li, 2000, pp. 344-345)。
2. 目前所知，當代這類研究以 1953 年 Lach 在 “The Sinophilism of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一文為英文學界中較早之研究成果，文中指出伍爾夫的中國哲學知識來自衛方濟，尤其是《中國六經》中《大學》和《小學》二書對教育的描述。1979 年 Mungello 在 “Some recent studies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一文，延續 Lach 的資料性研究，對幾篇中國對近代歐洲思想發展的影響作一概述。
3. 根據費賴之研究，衛方濟名下的文本共計廿三件，部分為詩歌或書信，本文僅介紹已經取得的，且與中國相關的七件文本，詳參 Pfister (1932, pp. 418-419)。根據魏若望的研究，衛方濟的經典翻譯還包含《道德經》，因為筆者尚未得見，無法介紹，請參閱 Witek (1982, p. 216) (轉引自 Mungello, 1983, p. 527)。
4. 《人罪至重》一書在 1698 年北京出版，本文所見為上海慈母堂 1873 年版，印自萊頓大學漢學系圖書館。中文學界目前僅見一文曾經對此書稍加著墨，討論西方傳入的人體知識，請參閱祝平一 (1996, 頁 47-98)。透過 Google Books 的搜尋引擎卻發現有兩本中文書被列入衛方濟名下：《默中之平》和《信經引義》，出版者是「天主堂印書館」，未標記年份。由於 Google 並未提供瀏覽，因此無法進一步確認，有待日後繼續發掘。因此《人罪至重》一書是目前確認、且已經取得的文獻中唯一中文著作。
5. 此文不詳細介紹這本書，細節請參閱潘鳳娟 (2009a)。
6. 衛方濟，《人罪至重》，卷一，頁 2b-3a。
7. 衛方濟，《人罪至重》，卷一，頁 22b-23b。
8. 推測應該是《中國禮儀事件》(*De Sinensium politicis ritibus acta, seu praeludium ad plenam disquisitionem de cultu Confucii et defunctorum*, 1700)，詳見馮承鈞譯 (1995, 頁 378)。中譯本

- 譯文刪除了原文第 379 頁一段發生在 1681 年有關磕頭事件的描述，詳見 Pfister (1932, p. 379)。費賴之說此書成稿於 1682 年，1700 年在法國里昂出版。
9. 本人所見版本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 FRBNF31021854。文件作者的署名有部分並非衛方濟，而是龐嘉賓。
 10. 此文中文原文已經重印出版，見《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九冊（鐘鳴旦、杜鼎克編，2002，頁 21-50）。
 11. 此文中文原文見《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九冊（鐘鳴旦、杜鼎克編，2002，頁 63-90）。
 12. 嚴謨之原文見《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一冊（鐘鳴旦、杜鼎克編，2002，頁 37-46）。而萬濟國〈福安辯祭〉的原文則請參閱李西滿的〈辯祭參評〉，收入《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冊（鐘鳴旦、杜鼎克編，2002，頁 363-438）。衛方濟也摘介嚴謨的 Ci Cao（祭考），見（Noël & Castner, 1703b, pp. 67-68）。不過目前中文書目中，未見此文，也許與嚴謨另一文〈考疑〉有關，待查證。
 13. 夏大常，〈贛州夏相公聖名瑪第亞回方老爺書〉，收入《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冊（鐘鳴旦、杜鼎克編，2002，頁 35-43）。
 14. 見 Noël & Castner (1703b, p. 72) 標題中之 Hia Matthias 是夏大常教名，根據陳綸緒考證，此人教名瑪第亞，是江西贛州之教理講授員（catechist），參見 Chan (2002, pp. 39-40)。其著作目前可見有八種，已經重印出版，均收入於《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冊（鐘鳴旦、杜鼎克編，2002，頁 1-144）。
 15. 現藏於耶穌會羅馬檔案館，編號 Jap Sin I, 206，請參見 Chan (2002, pp. 268-273)。另詳見利瑪竇研究所藏書樓目錄，<http://ricci.rt.usfca.edu/bibliography/view.aspx?bibliography-ID=1845>（檢索日期：2010 年 1 月 10 日）。
 16. 原文如下：“Nam nullus interuenit facrisiculus, vel ex Idololatriæ secta Ministellus, *nihil omninò fit ab Idoloatris insitutum, sed soli studiosi, & Philosophi conueniunt, Confucium tanquam Magistrum suum agnoscentes, ciuilibus, ac politicis Ritibus ex sua prima institutione ad merum cultum ciuilem institutis.*” Cf. Noël & Castner (1703b, p. 94).
 17. 中文書名採馮承鈞之譯法，參見馮承鈞譯（1995，頁 422）。
 18. 潘鼎曾經指出衛方濟率先編制過一份《中西對照恆星表》，又說衛方濟曾將《靈臺儀象志》、南懷仁《星圖》和閔明我《方星圖》作對比，請參見潘鼎（1989，頁 359）。
 19. 1688 年至 1689 年，法國出版了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兩個法文節譯本《孔子的道德》和《孔子與中國道德》；1691 年，英國出版英文節譯本《孔子的道德》，英法譯本的出版為擴大閱讀面提供了前提，使更多的歐洲人瞭解中國文化。
 20. 朱熹，〈大學章句〉，收入《四書章句集註》，頁 1。
 21. 有關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圖書館所藏衛方濟檔案，高華士（N. Golvers）博士提供如下資訊：“The mss. of his translation are in Brussels, Royal Library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Albertina), Section Mss., shelf number 19.930 (Immutabile Medium), 19.931 (Memcius [sic]); another ms. of F. Noël's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is now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St.

- Petersburg (see B. Dorn & R. Rost,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et xylographes orientaux de la Bibl. Impériale Publique de St. Petersbourg*, 1852, p. 618-619, no. 842; *Bibliotheca Sinica*, col. 1395.” (2009年8月28日高華士博士之電郵)。
22. François Noël, *Libri Sex*, “Preface”, p. 3 (轉引自 Mungello, 1983, pp. 518ff)。
23. 該圖書館所收衛方濟的著作從書卡可見有 15 種，不過許多書卡所列書目重疊，有的是複本，有的是同一編號不同書籍在不知名原因下裝訂成一冊，書卡逐一分列，因此有一編號出現兩種甚至三種書籍，或一書籍在不同書卡與編號中出現。請參閱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in Prague (http://www.nkp.ca/_en/index.php3)。
24. 有關此圖書館前身耶穌會院、布拉格耶穌會的歷史以及重要館藏珍本書目，請參閱 Richterová & Čornejová et al. (2006)。
25. 筆者發現，自利瑪竇以來，似乎無力解決與面對「太極」的問題。利瑪竇批評「太極」非出自古代經典，以此排除其根基，但是如果中國思想家對「太極」的解釋與經院神學對那至高者的詮釋很接近，那麼耶穌會將面臨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
26. Noël (1711c) Tract. I. cap. 3. Quæst. 2, § 3, pp. 174-179, entitled: *Publica & suthentica Interatoris Tartaro-Sinica Kam hi Testimonia quibus Tien ac Xam Ti, & quorundam Rituum Sinicorum circa Defunctos controversorum legitimus sensus declaratur*. 底線為筆者所加。
27. 請參見 Noël (1711c) Tract. II. cap. I. Quæst. I, p. 2: *An Lignea Tabella, quam Sinæ Defunctis erigunt, sit superstitiosa ex fine suo intrinseco aut extrinseco, seu ex fine operationis aut operantis?*
28. 這個問題實際上關涉到此書第一部分的「第一存有」論證，因為討論天主教禮儀的功效還涉及一位在世界之外創造自然萬物的創造主。若欲深入探討，必須一併思考斯賓諾莎 (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 在其 *Ethics* 一書中對 natura naturans (能產的自然, Nature naturing) 與 Natura naturata (被產的自然, Nature natured) 所提出的解釋。有關斯賓諾莎的 *Ethics* 一書全文，請參見 <http://frank.mtsu.edu/~rbombard/RB/Spinoza/ethica-front.html> (檢索日期：2010年01月11日)。這個問題未來將另闢專文深入探討，感謝江日新先生對此問題所提出的意見。
29. “‘Ex opere operato’, i.e. by virtue of the action, means that the efficacy of the action of the sacraments does not depend on anything human, but solely on the will of God as expressed by Christ’s institution and promise. ‘Ex opere operantis’, i.e. by reason of the agent, would mean that the action of the sacraments depended on the worthiness either of the minister or of the recipient.” See *Catholic Encyclopedia*, <http://www.catholic.org/encyclopedia/view.php?id=10275> (accessed: 31 Oct. 2009). 另可參閱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Malden, Blackwell, 2001, p. 515): “Sacrament are efficacious *ex opere operantis*- literally, ‘on account of the work of the one who works. Here, the efficacy of the sacrament is understood to be dependent upon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the minister. Sacraments are efficacious *ex opere operato*-literally, ‘on account of the work which is done.’ Here, the efficacy of the sacrament is understood to be dependent upon the grace of Christ, which the sacraments represent and convey.”
30. 參閱潘鳳娟 (2009)，同註 5。

31. 請參見 Noël (1711c) Tract. II. cap. I. Quaest. I, § II, p. 4.
32. 這或許應該與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 1566-1640) 的《西學修身》、《齊家西學》和《治平西學》對照。
33. 秦家懿在其 *Moral Enlightenment* 一書中，指出伍爾夫發現在柏應理譯本與衛方濟譯本中，幾個重要概念的翻譯並不相同。經查兩書原文，確實如秦家懿所言 (Ching & Oxtoby, 1992, p. 162, note 42; pp. 172-173, note 68)。
34. 李文潮指出：伍爾夫從衛方濟譯本所認識的中國實踐哲學，促進了哲學從神學獨立的過程，他認為這是德國啟蒙運動的信號。請參閱李文潮等譯 (2002, 頁 287-288)。

參考文獻

衛方濟著作

- 衛方濟 (1698)。 **人罪至重**。(本文所見為上海慈母堂1873年版)。
- 鄭德第、朱靜、耿昇、呂一民等 (譯) (2001)。J.-B. Du Halde編，F. Noël著。關於中國傳教會現狀的匯報。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I)** (Mémoire sur l' état de la Mission de Chine en 1702)。鄭州：大象出版社。
- Noël, F. & Castner, C. (1703a). *Memoriale circa veritatem et subsistentiam facti, cui innititur decretum... Alexandri VII, editum die 23 martii 1656 et permissuum rituum sinensium itemque circa usum vocum "Tien" et "Xamti," ac tabellae "Kim Tien"* [1656年三月23日教宗亞歷山大七世之中國禮儀許可有關稱呼天與上帝與敬天牌匾的記錄]. Rome.
- Noël, F. & Castner, C. (1703b). *Summarium novorum authenticorum testimoniorum tam Europaeorum, quam Sinensium novissime è China allatorum* [對中國學者關於禮儀問題之論證的摘要]. Rome.
- Noël, F. & Castner, C. (1704). *Responsio ad libros nuper editos sub nomine illustriss D.D.* [對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答覆]. Episcoporum Rosaliensis & Cononensis super controversies Sinensibus oblata sanctissimo domino nostro Clementi PP. XI a patribus Francisco Noel, et Casparo Castner Scoietatis Jesu missionariis & procuratoribus Sinarum mense Septembre .
- Noël, F. (1710). *Observationes mathematicae et physicae in India et China... ab anno 1684 usque ad annum 1708* [1684~1708年在印度和中國的數學物理觀察記錄]. Pragae: J. J. Kamenicky.
- Noël, F. (1711a). *Historica notitia Rituum et Ceremoniarum Sinicarum* [中國禮儀札記]. In Colendis Parentibus ac Benefactoribus defunctis, ex ipsis sinensium authorum libris desumpta. N. D. CLEMENTIS PAPÆ XI ET SUPERIORUM PERMISSU.

Prague: typis Universit: Carlo-Ferdinandae, in Collegio Soc. Jesu ad S. Clementem, per Joachimum Joannem Kamenicky Factorem.

Noël, F. (1711b).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中國六經]. Prague: J. J. Kamenicky.

Noël, F. (1711c). *Philosophia sinica* [中國哲學]: *Tribus Tractatibus, Primo Cognitionem Primi Entis, Secundo Ceremonias erga Defunctos, Tertio Ethicam, Juxta Sinarum Mentem complectens* (CLEMENTIS PAPÆ XI ET SUPERIORUM PERMISSU). Prague: typis Universit: Carlo-Ferdinandae, in Collegio Soc. Jesu ad S. Clementem, per Joachimum Joannem Kamenicky Factorem.

Noël, F. (1783-1786). *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 [中華帝國經典]: *précédés d'observations sur l'origine, la nature et les effets de la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ans cet empire (par l)* (Pluquet abbé). Paris.

研究專著

李文潮等 (譯) (2002)。萊布尼茨與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

祝平一 (1996)。身體、靈魂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知識。*新史學*，7 (2)，47-98。

耿昇 (譯) (1995)。榮振華 (Joseph Dehergne) 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 (上) (下) 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梅謙立 (Thierry Meynard) 等 (譯) (2005)。萊布尼茲 (G. Leibniz) 著。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鄭州：大象出版社。

馮承鈞 (譯) (1995)。費賴之 (Louis Pfister) 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

潘鳳娟 (2007)。無神論乎？自然神學乎？中國禮儀之爭期間龍華民與萊布尼茲有關中國哲學的詮釋與再詮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7，51-77。

潘鳳娟 (2009a，8月)。天主、罪人與聖治：衛方濟與《人罪至重》初探。論文發表於比利時南懷仁協會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合辦之「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odern China」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

潘鳳娟 (2009b)。皇帝的孝道——法國耶穌會士韓國英譯介《御定孝經衍義》初探。*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8，147-188。

潘籟 (1989)。中國恆星觀測史。上海：學林出版社。

鐘鳴旦、杜鼎克 (編) (2002)。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利氏學社。

Abel-Rémusat, J. P. (1826).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3)*. Paris: Dondey-Dupre1, pere et fils.

Abel-Rémusat, J. P. (1829).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2)*.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Chan, A. S.J. (2002).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 Bouvet, J. (1699). *The history of Cang-Hy the present emperour of China present to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London: Print for F. Coggan, in the Inner-Temple-Lane.
- Ching, J., & Oxtoby, W. G. (1992). *Moral enlightenment: Leibniz and Wolff on China*. Sank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
- Dehergne, J. (1973).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Paris: Letouzey & Ane.
- Lach, D. F. (1953). The Sinophilism of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4(4), pp. 561-574.
- Leibniz, G. W. (2002). Discours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 In G. W. Leibniz, W.-c. Li, & H. Poser (Eds.), *Gedruckt mit Unterstützung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 Li, W.-c. (2000). *Die christliche China-Mission im 17. Jahrhundert*. Stuttgart: Steiner.
- Minamiki, G. (1985).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Chicago :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 Mungello, D. E. (1983).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in the West.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western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rival of Matteo Ricci, S. J.* (pp. 516-539). Taipei: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Mungello, D. E. (1995).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 Longobardo, N. (1701). 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 In G. W. Leibniz, W.-c. Li, & H. Poser (Eds.), *Gedruckt mit Unterstützung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 Noll, R. R. (Ed.) (1992).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645-1941*. (D. F. St. Sure, S. J., Trans.). San Francisco: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 Pan, F.-c. (2007).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Longobardo and Leibniz. In S. Lievens & N. Golvers (Eds.), *A lifelong dedication to the China mission: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Father Jerom Heyndrickx, CICM,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and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 Verbiest Institute K.U.Leuven* (pp. 491-514). Leuven: F. Verbiest Institute K.U.Leuven.
- Pfister, L. (1932).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 Richterová, A., & Čornejová, I. et al. (2006). *The Jesuits and the Clementinum*. Pragu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 Rule, P. (1995).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D. 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pp. 249-266).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 Rule, P. (2003). François Noël S. J. an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W. F. V. Walle & N. Golvers (Ed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pp.137-165).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Leuven Chinese Studies XIV.
- Witek, J. (1982). *Controversial ideas o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